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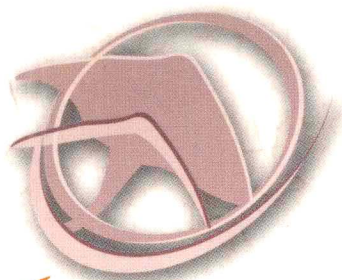


西安交通大学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学术文库

中国农户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研究

邵秀军 李树茁◎著



A

**Study of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for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安交通大学 · 学术文库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中国农户 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研究

邵秀军 李树苗 著



Study of Vulnerability
Measurement for Chinese
Rural Households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研究/郜秀军, 李树茁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3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3109 - 3

I. ①中… II. ①郜… ②李 III. ①农户 - 贫困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F323.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8977 号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学术文库 中国农户贫困脆弱性的测度研究

著 者 / 郜秀军 李树茁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26

责任编辑 / 赵学秀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责任校对 / 张延书

项目统筹 / 周 丽 赵学秀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5.25

版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字 数 / 191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109 - 3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以人口与社会系统工程方法为手段，以公共政策创新为导向，重点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性别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研究所致力于跨学科、交叉性地研究中国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前沿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追踪前沿动态，开展重大课题研究；既进行理论研究和分析，又注重改善社会现实，建立实验区，进行社会干预和实践；强调与各级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社会的紧密合作。研究所注重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已承担并成功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及国际合作项目，目前正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研究所在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研究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探索出一条寓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和创新、社会实践、政策传播和推广于一体的，用于解决重大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新型研究范式和路径。

在国际学术合作方面，研究所不断深化、拓展已有的国际合作网

络，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国际所、环境所、历史系、人类学系）、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南加州大学、美国 Santa Fe 研究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等国际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关系，形成了研究人员互访和合作课题研究等机制；同时，研究所多次受到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基金、美国福特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国际计划（Plan International）等国际组织的资助，合作研究了多项有关中国弱势群体问题的科研项目。国际合作使研究所拥有了相关学术领域的国际对话能力，扩大了国际影响力。

在政策研究与实践方面，研究所面向新时期国家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不断拓展与不同层次政府部门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合作网络，为研究的开展及研究成果的扩散与推广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研究所多次参与有关中国弱势群体、国家与省区人口与发展战略等重大社会问题的研究，在国家有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的共同合作与支持下，在计划生育/生殖健康、女童生活环境、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等领域系统地开展了有关弱势群体问题的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应用于实践，进行了社区干预与传播扩散和国家公共政策创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建立了多个有影响的社会实验基地，如“全国 39 个县建设新型婚育文化社区实验网络”（1998 ~ 2000 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巢湖改善女孩生活环境实验区”（2000 ~ 2003 年，福特基金会、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社会性别引入生殖健康的实验和推广”（2003 年至今，福特基金会、联合

国人口基金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其中,研究所在安徽巢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改善女孩生存环境的实验区,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对男孩偏好问题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全国“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

近年来,研究所在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支持下,围绕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领域的重大问题,将与性别失衡相关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公共安全、危机管理、公共治理、政府绩效、教育公平,以及包括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在内的社会发展制度的研究中;同时,研究所开始致力于以系统工程、复杂性科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为方法平台,综合人口、社会、经济、公共管理等学科领域,跨学科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期以性别失衡与公共安全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研究方向包括:改善女孩生存环境的系统研究和社会干预,男孩偏好文化、婚姻形式及养老模式,农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城乡人口流动的理论与政策创新,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老年人生活福利,性别失衡的社会人口后果,大龄未婚男性的性与生殖健康和权利,性别失衡的公共治理,农户生计与环境变迁,人口数学及其应用,国家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与应用,公共健康与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安全等。上述方向是中国目前人口与社会发展领域最亟须解决的重大战略和民生问题,体现了国家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宗旨,也是公共政策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

中国社会正处于人口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性别歧视、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弱势群体等问题日益凸现,社会风险和潜在危机不

断增大，影响并制约着人口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以社会性别和弱势群体保护与发展为核心的人口与社会问题，本学术文库将陆续推出其学术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概念界定	8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框架	22
第四节 数据与方法	25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评述	33
第一节 贫困脆弱性的概念与测量	34
第二节 贫困脆弱性的框架研究	43
第三节 与贫困脆弱性相关的理论研究	48
第四节 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61
第三章 贫困脆弱性指标构建的理论分析	65
第一节 贫困脆弱性测度的维度分解	66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对贫困脆弱性维度的影响	80
第三节 中国农户的贫困脆弱性形成框架	87
第四章 贫困脆弱性的指标构建	93
第一节 贫困脆弱性各维度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95
第二节 贫困脆弱性各维度的模型估计	110

第三节 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讨论	128
第五章 贫困脆弱性指标的特征研究	135
第一节 分布特征研究	136
第二节 人口统计学特征研究	140
第三节 贫困脆弱性的生计特征研究	144
第六章 贫困脆弱性指标的应用研究	151
第一节 研究思路	151
第二节 贫困脆弱性在农户生产选择中的应用	156
第三节 贫困脆弱性在农户消费选择中的应用	172
第四节 本章小节	189
第七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195
第一节 主要结论	195
第二节 政策启示	200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3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 1978 年开始到 2007 年，有将近 2.5 亿的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只剩下约 2000 万^[1]。这一扶贫史上的奇迹被包括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在内的许多国际机构给予高度评价，也自然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目前的共识是中国经济自 1978 年后每年约 9% 的经济增长是贫困发生率快速下降的重要原因^[2-4]。但学者们也意识到当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一个较低水平时，经济增长将很难再起作用，这也意味着帮助剩余贫困人口脱贫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的扶贫政策需要作出新的调整。另外，脱贫的效果越来越不稳定，一些贫困人口在脱贫以后重新返贫，以 2003 年为例，当年有 146 万人脱贫，但有 154 万人返贫，出现绝对贫困人口增加的现象。从绝对贫困人口向低收入人口或反过来从低收入人口回到绝对贫困状态的动态不稳定特征已经明显^[1]。贫困表现出带有长期顽固性的持久性贫困和高脆弱性特征的暂时性贫困

并存的新特征。

经济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今天的贫困未必就代表着明天的贫困，一个家庭的福利不仅取决于现在的收入和消费，也取决于其未来面临的风险^[5]。随着 Ravallion^[6]在其经典文献中将贫困分为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后，贫困动态理论得到快速的发展。许多研究显示，暂时性贫困的家庭比例要比持久性贫困的家庭比例高，穷人并不是“时时穷”，而是“有时穷”。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贫困脆弱性的概念应运而生，自从世界银行的2000/2001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将脆弱性界定为“度量对于冲击的弹力——冲击造成未来福利下降的可能性”^[7]，许多经济学家开始使用这一术语，并对它的测度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相对于贫困而言，从公共政策和社会保护的角度看，预测哪些目前并非贫困的家庭在未来会陷入贫困、哪些目前贫困的家庭在未来仍然难以脱贫对于制定和实施成功的扶贫政策将更加重要^[5]。

然而，尽管贫困脆弱性概念的提出是从动态的视角理解了贫困现象，从思想与理念上丰富了人们对于贫困的理解。但由于这一概念的提出时间较短，加之这一概念最初提出的目的仅是扶贫实践的需要，因此，在概念界定、基础理论、框架模型、维度分类、影响因素、测度方法、实践应用上都存在很大的争议，许多学派都在探索自己的方法。总体来说，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一，已往研究表明，要在动态的框架下预测贫困，面板数据是必须的，但是农户层次上的微观面板数据在发展中国家很难获得，这一数据上的要求将会极大地阻碍贫困脆弱性方法的推广与应用。在缺乏面板数据的前提下，探讨度量贫困脆弱性的方法问题就成为重要的课题。其二，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Chaudhuri et al.^[8]提出了一个使用横截面数据来度量脆弱性的简

单方法，他们认为如果消费支出变动的大部分能够被可观察到的家庭特征的异质性所解释，那么即使是一个截面数据也能够预测哪些家庭会陷入贫困。其后的许多学者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研究、讨论和应用，并逐步形成在贫困脆弱性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学派之一。但是他们的测度模型偏重于方法应用，缺乏理论基础。比如他们测度模型中的消费波动模型并没有理论上的指导，而影响消费波动的因素在各个国家、地区文化传统中都是不同的，因此，如果要将他们提出的测度模型应用到中国，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理论问题和适应性问题。其三，目前在贫困脆弱性度量研究中，基本上都是依赖统计学的方法，如何使用统计理论尽可能减少误差。在没有考虑脆弱性决定因素，或者说没有一个理论框架在先的情况下，显然会给贫困脆弱性的测度带来偏误；另外，测度贫困脆弱性的最终目的是扶贫，帮助那些可能在未来贫困的家庭摆脱贫困，因此，理解贫困脆弱性与生计策略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极少看到。目前，一些研究也发现持久性的贫困和暂时性的贫困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机制。McCulloch and Calandrino^[9]对中国四川省农村的研究表明，持久性贫困多与资本积累、地理位置、收入能力等因素有关，而暂时性贫困则取决于风险与风险防范的能力。因此，他们建议对两类贫困的治理应采取不同的政策。从社会政策制定的角度看，提前预测哪些目前并非贫困的家庭在未来会陷入贫困，哪些目前贫困的家庭在未来仍然难以脱贫就显得十分重要^[5]。这需要对脆弱性家庭进行确认和甄别，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简易但有效的测度指标能够使扶贫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有效地识别哪些人是高脆弱性的群体，以便采取不同的社会公共政策。然而，中国政府、非政府扶贫组织和学术界目前虽已认识到现阶段的不同贫困类型，但对如何测度不同类型的

贫困并确认高脆弱性的群体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指标。

从应用的角度出发,要构建一个能测度和衡量中国农户中高脆弱性群体的指标,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户的一些主要生计特征及其近年来的变化。中国农村农业基础薄弱,农村经济发展缓慢是非常主要的特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农业“靠天吃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非常大。中国是一个季风性气候的国家,降水量集中在一年中仅有的几个月,春旱、夏涝、秋霜、冬冻等自然灾害常年发生,严重影响了农户的农业生产^[10,11],是中国农户长期以来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逐步实施了市场经济的改革路径,农户面临的风险增加了新的特征,即市场的不确定性带给农户的风险已成为近年来农户所面临的主要风险,譬如农民希望通过种植经济作物提高经济收入,但是由于缺乏信息等,农户在选择种植某类经济作物时常会受到上期经济作物价格的影响而不能充分考虑其他农户的选择,产生了诸如“发散性蛛网模型”式的价格波动,使得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加大,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期望赢利,反而很有可能产生损失^[12];再如一些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希望外出就业获得劳务收入,但是劳动力市场也同样充满不确定性,加之中国的户籍限制,农民在城市打工只能成为农民工而不能成为永久性市民,农民工不能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地位较低,在近年的新闻中常有如工资拖欠、缺乏劳动保障等报道。除了农民收入上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外,农民在支出方面也面临市场经济所产生的不确定性或支出远超出承受能力的风险。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大大增加了农民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已成为导致农户贫困或返贫的重要原因,高额的教育费用使许多农村的学生即使考上了大学也未必能上得起大学或者能安心在大学学习,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易使低收入农民“因病致贫”等。有调查

表明^[13]，大多数农户的经济困难来自家庭成员生病后的高额医疗费用、高额的大学学费和结婚费用等，这些超出普通家庭年收入 10 倍左右的支出困扰着家庭的生计决策，王跃生^[14]的研究发现农村中的父母在为儿子完婚中将多年的积累耗费殆尽，甚至欠下债务。这不仅制约着父母的消费方式，而且束缚着父母的养老观念。父母要花大约 10 年的时间为儿子结婚做准备：盖房、支付彩礼、迎娶儿媳过门。同时，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农户农业生产面临更严峻的形式，如土地板结、肥力下降等，农户的传统生产经营活动更加依赖于现代投入要素如化肥等，而这些与市场关系都很密切。总之，多种风险交织是农户风险的一个突出特点，加剧了农户的脆弱性^[15,16]。更为重要的是，风险和经济困难对农户的影响涉及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且相互影响，譬如由于得不到很好的营养和休息，农民患病的可能性非常高，而生病后又因为缺钱或者不能得到及时医疗救治，极易发展成为慢性病，伴随着农民一生^[15]。

近十几年来，农民的风险管理策略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农村逐步建立起以集体保障为主与生产系统相重合的制度，如五保户供养、困难救济、合作医疗、信用合作、供销合作等。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市场化改革，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而逐渐被弱化甚至在有些地方名存实亡^[13]。与此同时，由农户直接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据陈传波的统计表明，近年来政府用于农村中的救济、抗灾等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这也表明政府和集体组织不再充当农民风险分摊的主体^[17]。农户已逐渐成为风险管理和风险处理的主体并形成了一些应对风险行之有效的方法与策略，其中，利用劳动市场的外出务工成为中国农户风险管理策略的新特征。20 世纪 80 年代，农户收入的增加主要依靠

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曾明确将中国减贫的巨大成就归于农业增长^[18]。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收入来源。数据显示，1978~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140元，扣除物价因素，平均每年增长7.1%。而农业收入对农户的贡献率在不断下降。2007年，农村家庭平均人均纯收入是4140元，主要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1596元，约占39%，种植业收入为1303元，约占31%。与1990年相比，农村居民平均人均纯总收入增长了6倍，工资性收入增长了11.6倍，而种植业只增长了3.8倍。1997年以来，农民外出务工收入一直呈两位数增长，在工资性收入中占有突出地位。2001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为36.5%，到2007年，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已经达到40.8%。从总体上来衡量经济发展对于农村人口的福利影响，其贡献是巨大的，农村生活在每天一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比例从1981年的65%下降至2001年的12.5%^[19]。许多研究也发现，农民缺乏的是金融性资产和生产性资产，劳动力则是欠发达地区农户非常重要的资源，当风险发生时，短期外出打工以谋取金融性资产是一种重要的风险处理机制。还有研究发现由于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减少了家庭内食物消费人口数，对解决家庭短期的食物短缺问题有很好的效果^[17]。总之，在现阶段，外出务工不但成为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也成为农户处理风险的一种新策略。

不断深化的市场经济对农户风险管理策略的另一个影响是对“人情社会”的冲击。已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社会是乡土社会和“熟人社会”^[20]。集体经济组织消失后，农户之间的关系依然紧密，而且长时间的居住使彼此了解，声誉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

作用。面对风险和损失，农户可以利用与邻居、亲戚构成的“关系网”相互借贷，这种非正规的相互援助为缓解风险起到了有效的保障作用^[21]。一些社会资本方面的研究也发现，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贫困者所需要的帮助，减少获取资源所需的成本，其中包括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社区共同体中包含的支持关系以及与非营利机构（主要指民间组织）建立的信任等。贫困者社会资本发挥自助保障功能的方式是多样的，如相互信任的社会关系有精神保障的作用，有支持关系的网络成员所握有的某些物品提供给需求者的行为可以产生物质的保障作用，社会资源的转借起到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成员在网络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相互支持对提高群体决策水平和抵御风险能力方面均有作用等^[22]。章元^[23]的研究发现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不仅能够直接有助于降低家庭的未来贫困，而且还能够有助于家庭应对负向冲击的影响，从而间接地降低家庭的未来贫困；另外，家庭所拥有的人力资本、户主是否为干部以及所拥有的资产的价值这些变量都能显著地降低家庭未来的贫困。然而，市场经济是逐利的经济，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有相互的挤出效应。在陈玉宇^[24]对广东省居民的风险共享的研究中就没有发现社会支持或者“人情”等对家庭的支持。在张爽等^[25]的研究中就发现，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在下降，而市场化减弱了社会资本的作用。

总之，如果说中国政府在解决绝对贫困、维持农民基本生存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在目前农村的贫困问题出现新的特征后，市场经济在向纵深发展的情境下，如何构建有中国文化特征和现实特征的预测贫困的指标，并在扶贫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措施。

第二节 概念界定

本节将对本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梳理并作出界定。

一 生计及生计分析的可持续生计框架

近年来,许多农户经济学的文献都在使用“生计”的概念表述农户的生产与生活状况,生计比收入有更广泛的含义,它指生存所需的全部资源及在此资源基础上所形成的策略^[13],生计这一概念更能完整地描绘穷人生存的复杂性^[26]。Chambers and Conway^[27]将生计界定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基础之上”。这个定义特别强调了资产和资产基础上选择的联系^[28]。诺贝尔经济学家 Sen^[29]对生计概念的贡献更突出了“可行能力”的重要性,认为生计中的资产除了有形的资产外,还应该包含无形资产,如有充足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可行能力”的引入扩大了生计概念的范畴,不再仅仅关注食物和收入等物质要素,还应重视人本身能力的发展。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Chambers and Conway^[27]将生计定义中的资产划分为两个部分,即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Scoones^[30]则将生计中的资产划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一些非政府的扶贫机构如 DFID (英国国际发展署)进一步将资产细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一划分得到了学术界和许多扶贫组织的认可,并将其引入到许多实践项目^[31]。大量研究认为,个人或家庭实施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取决于所拥有的资产状况,生计策略是通过系列生计活动来实现的。在不同的资产状况下,生计活动呈现多样性,并且相互结合来